

论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贡献

——兼驳诺曼·莱文等人的“对立论”

朱传荣

本文依据恩格斯早期和晚期的有关著作及其理论活动,系统地阐明了恩格斯人学思想的形成、特征及其与马克思思想观点的一致性;并以晚期著作中的若干理论观点,揭示了恩格斯人学思想的丰富性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贡献。此论题是当代西方学者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内理论界较少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完善化的杰出贡献者,他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中,有些人杜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这股“对立论”思潮发展到1975年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出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同创立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活动看做是“可悲的骗局”。他认为,马克思是从人出发的,奉行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哲学路线;恩格斯是从自然出发的,奉行的是以自然为中心的哲学路线。这种错误观点,代表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流派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共同特征。这些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批评恩格斯的哲学是“没有历史主体人”的“自然物质论”或“自然界主体论”。他们把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和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之间的差别歪曲为对立性的,然后再把恩格斯晚期的理论观点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观点对立起来,作为他们制造和宣扬“对立论”的“根据”。然而,不论什么样的篡改、歪曲和编造,都不能抹杀恩格斯人学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观点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和研究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贡献,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追溯恩格斯的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正确揭示出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点;二是要深刻理解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已包含了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和论述。国内出版有关研究恩格斯的著述中,对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和理论的评价,多是局限于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的几部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这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却很难深刻说明恩格斯的

突出贡献,更难于做到彻底批判西方学者们所谓“人学空场”、“缺乏人学辩证法”的错误观点。因为,西方学者把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的著作,硬说成是马克思一人的著作,否认恩格斯也是执笔人,说他只是校注者。因此,我们必须粗略地谈下恩格斯关于人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从中阐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上的独特见解和杰出贡献。

一、恩格斯早期人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征

1837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迫于父亲的要求,到他父亲的营业所里实习经商,从此,他对人的问题就艰难执着地进行着探索。实际上,这也是恩格斯整个理论生涯的起始和不断向前进展的理论主题。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他始终把对人类的生存、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解放等问题的探寻,看作是建立科学的理论活动的主题。正是对这个主题的深入剖析和研究,并且紧紧结合着对历史观的剖析和重建,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同那种把历史仅仅看作是文化史、或是理性和自我意识实现的历史理论从原则上区别开来。恩格斯在中学读书和走进社会期间,虽然接受了卢梭、海涅的自由精神的影响,席勒、白尼尔的政治激情的熏陶。他也曾一度把自己确认为是自由的歌手,但是,这都没有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和下层劳动群众所遭受的悲惨境遇对他影响的真切和深刻。恩格斯当时基于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权利的同情和忧虑,写出了针对巴门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檄文——《乌培河谷的来信》。为生活在苦难深重、一贫如洗的工人呼吁,痛斥工厂主是对工人和儿童的无耻剥削者。因此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现实性的烙印。争取和维护劳动人民的生存权,为促使社会进步和改善人类生活的人道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就成为青年恩格斯主导的思想倾向。以后,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又深化了这个思想。由于这种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倾向,使得恩格斯对社会现实和流行的理论以理性原则进行甄别。随后,恩格斯对谢林的启示哲学的批判,以及与施特劳斯的原则分歧,究其根源就在于彼此对人的生存、命运及其社会关系所持态度的不同。施特劳斯等对社会进步持敌视态度,对人的生存和命运以思想的虚幻性来掩盖其漠不关心的反动性;恩格斯对现实人的生存、命运及其社会关系是持极为关切和批判的态度。综观恩格斯当时的理论活动情况看,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之所以对他发生较大的影响,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该书里把宗教关系归结为人的关系,并揭示出人本学是神学的真正奥秘之所在。就恩格斯当时的思想状况看,无论他是信仰宗教,还是摒弃神学,都是与他对人性和人的思考有着内在的因缘。这在恩格斯1839年6月15日致格雷培的信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当他还是有神论者的时候,他说“要是有人对实证的基督教采取傲慢态度,我就起来捍卫这个学说,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着重号引者所加)。^①当他以无神论立场批判神学历史观的时候,他是从人的本质去理解宗教的世俗基础的,他认为历史既不是神的启示,也不是“绝对观念”外化,更不是自我意识的实现,而是人的启示。他在《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又说:“其实神不过是由于在自己不发达的意识的混乱材料中的反映而制造出来的。”“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②由此可见,恩格斯力主用人的历史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真实内容,不仅如此,他还以人的类本质揭示国家的本质,批判了君主制国家的虚伪性和神秘性。当时,恩格斯在批判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时说:“如果说国家的本质象宗教的本质一样,也

是在于人类自身的恐惧，那末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家里，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点。”^③他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排斥人的自由的；在君主立宪的国家中，尽管人们相信社会进步是人类的本性，但在国家对人的恐惧下，人们还缺乏公开宣布这种进步的勇气。所以，他说：基于对人的恐惧，“人们已经相信进步是人类的本性，但是还缺乏公开宣告这种进步的勇气”。又指出，恐惧本身“只能证明满怀恐惧的人不是真正的人，不是自由人”^④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观点，同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时，也是从人本的角度，运用“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这两个对立的观念去批判的。他说：“黑格尔却不把社会团体、家庭等一般法人理解为现实的经验的人的实现，而是理解为本身只抽象地包含着人格因素的现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才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出现实的人。因此，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高现实，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格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了人的本质异化、复归等问题。在当时，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异化、异化的克服和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他一再高扬人的本质的伟大，强调人只有认识自己的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人的本质去估量社会关系，去安排人的生活方式，去安排世界的发展。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也要根据人的本性的需要作出如何去选择。恩格斯以激昂的语气写道：“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⑥诚然，恩格斯当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没超出理性主义的范畴，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很鲜明的，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意识。但是，却与纯粹人本主义的实质还是有差别的，他当时关于人的思想不是纯抽象的和纯理性的，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的人的异化状态的考察和思虑，并对造成这种异化状态的私有制、竞争和当权者的利益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他不是完全象理性主义者那样，以违背人的本质抽象原则去揭露现实的虚伪性，而是以私有制及其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合理性去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和国家的反人道性。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恩格斯以现实的私有制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来批判人类现状的不合理性，提出要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重任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说，恩格斯初期的人学思想是一种紧贴现实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当时的人学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这是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前提。这一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对英国当时社会状况的剖析，又进一步深化和理论化。

综上所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从对乌培河谷劳动人民的境遇的揭露到对英国工人状况的剖析，都始终萦绕着他对人的现状的关切、同情、忧虑以及如何改善和克服人类现状的非人性问题。从而，一方面足以说明如费切尔、蒂尔等西方一些学者关于恩格斯一生都未涉猎人的领域的观点是多么的谬误；另一方面表明，恩格斯在独特道路上形成了与马克思相似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雏形。在这同一时期，马克思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劳动异化来说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中经济上的竞争、剥削的剖析，对政治上的极端手段的揭露，揭示了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如果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具有较浓的思辨性特点，那么，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则具有从实际材料中吸取和形成自己的人学思想的现实性特点。但是，他们两人都注重研究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在人的本

质关系形成中的意义，他们的这个共同点是根本性的，二人的差别是非根本性的。正因为他们各自为了劳动人民利益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中，分析了大量的现实政治问题和初步研究了经济关系问题，才有可能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同写出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巨著，彻底摒弃和批判了具有费尔巴哈印记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抽象人性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类理性”和自由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由、正义与平等的说教。在分析研究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从物质利益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揭示了人的本质，得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共识，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恩格斯在和马克思共同创立新哲学的过程中，对于作为历史主体人的意义和研究是十分注重的，研究的结论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就是说，作为历史主体人的劳动从本质讲是积极的改造性的活动，因而才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著的第二部巨著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⑧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观点，完全可以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等思想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和完善。西方学者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学观上的“对立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与历史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错误观点。

二、恩格斯晚年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是 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突出贡献

诺曼·莱文断言，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是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相背离的，悉尼·胡克和代维·麦克莱伦则认为，马克思学说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恩格斯晚年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问题取代了这个中心问题。这些论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是相反的。恩格斯晚年在理论建树中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充分发挥和完善。

恩格斯晚年，在占有大量关于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对此问题，人们较少注意研究。）关于人和人类起源的问题，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给予强烈关注和深刻研究。他认为，要说明人的社会属性，就必须具体地阐明人在同自然的关系中，人是怎样从其他动物中发展和提升出来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人从其他动物提升出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生产劳动。人能制造和使用的劳动工具、人自身的手、语言、意识以及思维抽象能力，都是由于劳动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他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⑨这是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早期关于劳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的思想进一步的发挥。同时，人的劳动是社会性的。这样，人就不仅具有自然的属性，而且还具有由劳动凝结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社会属性。从而彻底地把现实

的人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区别开来，使“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论断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实际和更为具体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诺曼·莱文同西方一些学者一样认为，恩格斯将自然界独立于人之外，对人和自然都作了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说明，把人本主义的历史主体简单化，乃至把自然界视为主体，人成了自然界的消极客体。莱文的这种断言，完全是混淆视听的编造。恩格斯从来既没有脱离开自然谈人，也没有脱离开人谈自然。他同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承认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强调，在人类产生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的，人不是与自然界相对立的消极客体，人是能动的积极作用于自然的主体。人和自然是在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中发展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和人类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可以说，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40年之后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系列著作中，都坚持和阐明了人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实践，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科学原理。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的论述相比马克思更为系统和集中的，莱文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

诺曼·莱文重复着悉尼·胡克的错误观点，指责恩格斯把人与自然界完全分离开来，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把技术夸大为有绝对的决定权，人变为次要的因素。莱文的这种责难，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又一个编造，实际上，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⑩这里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科学技术并非拥有对自然的绝对决定权，说明了人类在使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界时，要充分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性，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根本不存在莱文的所谓“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问题。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诺曼·莱文同西方一些学者一样，指责恩格斯的理论是“没有人的理论”，认为恩格斯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乃至把人也看成是经济因素之一。这种说法也是不合实际的。首先从恩格斯于1844年发表的《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和《神圣家族》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和《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中，他都独特地阐明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以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其次，在他晚年的几部论著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书信中，又对这些问题作了更为广泛和更加深刻的阐述，并对当时把他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作了严肃的批判，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合力”的思想。这既是对资产阶级学者保·巴尔特污蔑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谬论的有力批判，又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and 个人的作用问题最深刻的说明。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⑪在这里，恩格斯好象也预见到象诺曼·莱文之类要要进行歪曲，早就做好了批驳似的。他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

“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⑫这里，我们之所以作这样的引证，就在于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突出贡献。因为它既充分说明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又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and 个人的历史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唯物史观不仅没有否定个人的历史作用，而且充分肯定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但是唯物史观肯定个人的历史作用，同英雄史观是根本不同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肯定个人的历史作用的辩证统一，认为“人们的社会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个人创造历史的能力越高，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就越强大。莱文攻击恩格斯将个人的作用湮没在虚幻的集体中，变成了一种“经济因素”的谬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只不过是一时掩人耳目的谎言罢了。

三、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对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一大光辉贡献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年，为执行马克思的“遗言”，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在研究和吸取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婚姻、家庭及其形式发展变化的历史和规律性。他依据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具体指出和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⑬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历程中，这两种既互相联结、互为条件的生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地区内，它们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程度和方式是不相同的。据此，恩格斯详细考察和说明了家庭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更替和演进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恩格斯的这个两种生产的理论，是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一个最突出的重大贡献。因为：（1）它具体地展示了人在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主导作用；（2）它深刻阐明了人在家庭形式的变化、氏族公社的演进、私有制和国家等社会形式发展中的能动作用；（3）它从大量实证材料中更为具体地说明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深刻揭示了生产劳动不仅赋予人的最根本的社会属性，而且也赋予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属性。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现实的社会制度，人类自身的生产就会失去唯人类所特有的意义。恩格斯的这一贡献，可以说，也是对马克思早期提出的关于脱离了社会关系，人的自然属性就会变为动物的机能这个论断的深化和具体化。

关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意义问题，包括诺曼·莱文在内的西方学者提出的两种相关的诘难，需要我们作些澄清和批判。

英国的代维·麦克莱伦指责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一种机械论的划分。并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恩格斯这种划分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表明它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对立的。这就是说，在麦克莱伦看来，马克思是反对两种生产理论的了。其实不然，两种生产理论并非是恩格斯一人提出的，早在40年前马克思同他在共同制定唯物史观时，就把两种生产看做是唯物史观的基础而加以论及。两种生产理论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思想，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反对或不同意两种生产理论的情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历史的三个前提，不是三个不同阶段，而是同一

历史的三个方面时曾说：“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⑭正因为明确了历史存在的这种前提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这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⑮由此可见，恩格斯晚年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和阐述，是严格坚持和发挥了他和马克思在40年前就已经明确提出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根本不存在“更正”或“抛弃”“原初的观点”，更不存在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对立的问题。至于两种生产划分的意义，已在前面阐述了。麦克莱伦的所谓“这种划分本身没有意义”的断言，只不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肤浅知识的写照，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的表白罢了。

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二种责难，则是诺曼·莱文对两种生产理论中的人口问题的挑剔。他认为，恩格斯关于“种的蕃衍”理论忽视了人口问题给人类社会发 展所 设 定 的 陷 井。指责恩格斯对于人种的无限蕃衍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阻碍作用，未予以重视是 错 误 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完全不是莱文所断言的那样，恩格斯早在40年代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对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贫困危机和罪恶，都归结为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生产增长的速度，以及用暴力和饥饿的办法去消灭过剩人口等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其中根本未否认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莱文的责难，说明他和马尔萨斯有共同的思想观点，即对人的发展的憎恨和仇视，就其认识方法说，莱文同马尔萨斯一样，没有认识到人是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这一辩证关系。人的蕃衍与就业、生产资料的分配不是对立的，特别是在当时，人自身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并未出现尖锐矛盾。马尔萨斯却从为资本家追求最大剩余价值，而又想不发生任何矛盾和曲折的思想出发，大肆宣扬“人口过剩论”，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一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形而上学。因此，恩格斯曾指出，当时出现“人口过剩”问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不是人自身生产造成的。其次，恩格斯在提出两种生产理论时，也阐述了两种生产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问题，并未片面强调人自身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说明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莱文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歪曲和攻击，其目的并不全在两种生产理论本身，而是基于他们对整个唯物史观和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否定和反对的需要，这是 不 证 自 明 的“公理”，勿需多言。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⑭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4页；第1卷第650—651、681、689、292、650、第2卷第118—119页，第3卷，第24、517、33页。

⑪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479、2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